拓展「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介紹科技部近年在該領域的四個大型計畫

陳玨*

從上世紀末開始，西方的「漢學界」出現關注「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的趨勢。近二十多年來，它漸成一股學術潮流，漫卷歐美的人文社會學界，也波及中文世界。在中文世界中，臺灣著其先鞭，引領風尚，從 2008 年到 2014 年間，科技部人文司[1] 接力核定了「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四個大型研究計畫，包括：（1）為期一年半的「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暨研習營」學門規劃推動計畫（2008-2009）；（2）為期兩年的「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2010-2012）；（3）為期兩年的「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擴展」整合型研究計畫（2012-2014）；（4）為期三年的「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Consortium for Sin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拋光計畫（本計畫由人文司、科國司共同核定）。

這些計畫具有「大型性」、「創新性」和「連續性」，構築一個縱貫七年的時間板塊，自執行以來，在海內外引起相當大的迴響與好評，也吸引北美、歐洲和東亞各國許多知名學者的共同參與，其中「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已為 2011 年《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列入科技部人文司「臺灣及中國文學」學門該年重點介紹的三大計畫之一。目前，這一系列計畫的執行時近尾聲，已在中文世界形成一個國際間認可的特殊研究領域與社群的雛形，我們稱之為「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

筆者有幸主持以上各項計畫，多年來得到國內外不少學術同仁的幫助和指教，獲益良多，在此藉《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寶貴篇幅，與讀者分享計畫

---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本文所稱「科技部」為「前國科會」、「科技部人文司」為「前國科會人文處」、「科國司」為「前國科會國合處」，特此註明。

的執行心得，以拋磚引玉。下文依次序分門別類，介紹這四個「一以貫之」大型計畫的來龍去脈。先從這一系列大型研究計畫的起點——亦即科技部學門規劃推動計畫「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暨研習營——談起。

一、 科技部學門規劃推動計畫「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暨研習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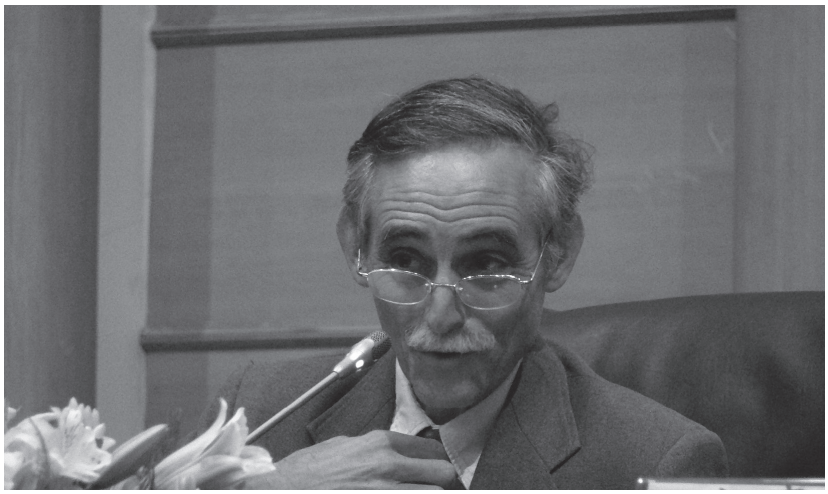
要找到在「漢學」脈絡中推展「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的「始作俑者」，需從牛津大學中國藝術史講座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為起點。筆者曾多次撰文談到：雖然在西方的物質文化研究，從十九世紀中葉便開始萌芽，到二次戰後已經走向成熟，然而直到上世紀末，才有學者成套運用物質文化研究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其中的轉折性事件，便是柯律格在1991年出版了一部轟動當時漢學界的書，名叫《「長物志」——早期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身分》（*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該書的出版，使漢學界不少同行看到了採用「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文化史的獨特作用。這種認知，使物質文化研究在漢學領域中，荒徑漸開。

明代《長物志》的作者文震亨（1585-1645）是蘇州「文人圈」中的「聞人」之一，柯律格《「長物志」——早期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身分》一書，從《長物志》中涉及當時「吳門」文人日常生活中習見的「風雅」物品，諸如室廬、花木、水石、禽魚、蔬果、書畫、几榻、器具、衣飾、舟車、香茗之類入手，展開「社會身分」的討論，其中精確採用了物質文化研究的方法，為當時漢學界所罕見。柯律格從物質文化角度，重新發掘《長物志》這本「舊書」在今日社會文化史研究中的價值的舉動，引起英美漢學界同行熱烈的討論，並受到美國明代研究宗師級人物牟復禮（Fritz Mote）等著名學者的重視（筆者在近八年前，曾在香港撰文詳述此事，以上為濃縮介紹）。

柯律格《長物志》的研究受到重視，使其開始了一帆風順的學術生涯，先從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中國分館館長一職轉入大學任教，後來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禮聘為講座教授，到了2008年，再一次為牛津大學「挖角」，成為該校中國藝術史講座教授。繼柯律格之後，美國漢學界不少有識之士在新世紀來臨之際，紛紛介入這個領域，例如美國頂尖大學中，東岸有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韓書瑞（Susan Naquin）和哥倫比

亞大學教授高彥頤，西岸有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等，都開設物質文化研究所課程；其中韓書瑞開設的物質文化研究生課程，「課程大綱」竟然長達四十頁，內容豐富，琳瑯滿目。由此一「斑」，也可略窺近二十年來，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在歐美蓬勃展開，至今未衰之「全豹」。

西方漢學界的這股物質文化研究潮流，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從臺灣漸漸進入中文世界，首先引起中央研究院內學者的興趣，新世紀初的《新史學》出版過《物質文化研究專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邱澎生等籌劃），即為明證。筆者在近八年前，受到新世紀漢學潮流轉向中文世界回湧的感動，經余英時先生推薦，到新竹清華任教時，正值西方漢學界和臺灣學術界在物質文化研究領域的「邂逅相逢」之際。筆者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兼習文史，歷史方面受教於余英時先生與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開始注意到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的匯流，畢業後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和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任教十年，與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界有直接的交遊。以上學思經歷，使筆者初到清華時，有感於迄今為止的西方漢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總體局限在歷史學門或藝術史學門中，而文學學門卻長時期「缺席」參與，頓時萌生了希望嘗試立足中文世界，用打破文史分家的「跨界」視野，從文學學門介入這一領域的想法。這個想法得到時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廖炳惠的支持，於是筆者便在 2008 年向科技部提出大型學門規劃推動計畫，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筆者時任中心副主任）連袂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舉辦「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國際論壇暨研習營（2008-2009），邀請時任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倫敦大學歷史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ötter）、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講座教授艾爾曼（Benjamin Elman）和文學榮譽教授浦安迪（Andrew Plaks）、加州柏克萊大學藝術史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和歷史教授戴梅可、布朗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李德瑞（Dore Levy）、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等一系列國際知名漢學界「重鎮」來臺交流，旨在打通歷史與文學、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方面的通路，詳細可見筆者在 2009 年發表的〈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科技部「超越文本」規劃推動計畫前半部執行回顧〉（載《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十卷三期）和 2010 年發表的〈「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視野國際論壇暨研習營」研究計畫介紹〉（載《漢學研究通訊》二十九卷二期）兩文。這些會議活動的部分論文，後來則由筆者編成《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



圖一　參與「超越文本」計畫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浦安迪是漢學界在明清小說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一

圖二　參與「超越文本」計畫的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高居翰是漢學界在藝術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一

究新視野》，在 2011 年先以《清華學報》專輯形式問世，其後由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書。

筆者在主持科技部「超越文本」學門規劃推動計畫時，有幸同時執行國立清華大學「高羅佩與物質文化研究」增能計畫（2009-2010），兩者相得益

圖三　牛津大學講座教授柯律格（左四）應邀來臺演講時與講評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石守謙（左三）等合影

彰。筆者曾在報刊上撰文介紹：荷蘭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被譽為二十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六十名外國人之一。高羅佩的「三考」——討論北宋書法家米芾《硯史》的《米海岳硯史考》，研究明代春宮圖的《秘戲圖考》，探索中國動物文化史《長臂猿考》——每一「考」都具有權威的分量，無一不是當年漢學界尚未關注「物質文化」時代的「物質文化」研究。高羅佩的這一系列漢學著作，也可說是一座通過研究物質文化來「收藏中國」的「紙上博物館」，他本人更是早在柯律格之前，漢學界研究物質文化「史前史」中的「祖師爺」之一。柯律格對高羅佩十分推崇，這從柯律格上述名著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長物志」——早期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身分》）標題中，將文震亨《長物志》英譯成「Superfluous Things」一事便可知端倪：此英譯非柯律格自創，而是特意從高羅佩著作《書畫鑑賞彙編》（*Chinese Pictorial Art*）中一個小註解裡取來，而「放大」成書題。筆者 2010 年在臺北主辦紀念高羅佩誕辰百年的「收藏中國：高羅佩的遺產」國際論壇時，邀請柯律格到臺灣演講，雙方見面談起這一點，都不禁莞爾微笑。

總而言之，如果說科技部「超越文本」學門規劃推動計畫是一種「面」上的推動，那麼國立清華大學「高羅佩與物質文化研究」增能計畫，則可說是一個「點」的研究。因緣湊巧中「點」與「面」的結合，構成了筆者在本世紀第一

個十年的尾聲中，介入「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起點，也為後來執行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和「拋光計畫」作好了準備。

二、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及「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擴展」

承繼「超越文本」先導計畫的開拓，新階段的「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及「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擴展」兩個整合型研究計畫從 2010 年始，次第展開。如果說「超越文本」學門規劃推動計畫，作為科技部四個大型研究計畫的開端，是以文史兼顧登場，那麼這些大型計畫的主體——「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及「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擴展」兩個接力整合型研究計畫——則立足文學學門，由國立清華大學發起，前後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的六位資深和兩位年輕教授，先後加盟，接力「競跑」。這兩大系列性整合型研究計畫，透過融會文學與其他學門的「跨界」視野，以國際對等交流為導向，甚獲成功。

筆者作為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持人，在與各校同仁合作，集思廣益後，在計畫書中作出如下規劃：第一階段「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以戲劇、敘事文、詩歌三大文類為經，以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時代為緯，觀察特殊文類在特殊時代物質文化中呈現的風貌，其子計畫包括：

1. 國立臺灣大學王安祈教授：物質文化對非物質文化的影響——視聽媒介對京劇典範建立所起的作用及限制；
2. 國立政治大學高桂惠教授：怪怪奇奇之物——《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及其續衍之「游目」與「騁懷」；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室如助理教授：異國形象的物質符碼——晚清海外遊記中的飲食、服飾與城市文化；
4. 國立中央大學李元皓助理教授：物質文化對非物質文化的影響——視聽媒介和京劇傳播的關係；
5. 國立清華大學陳玨教授：晚清華人海外遊記與西人海內遊記中的崇外與懼外文化心理研究——以物質文化的跨界為例。

第二階段「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擴展」，將第一階段「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的「跨界」範圍拓展，研究團隊全由資深教授組成，其子計畫包括：

1. 國立臺灣大學洪淑苓教授：民俗節日的節物、象徵與詩歌表現——以明清到日治時期（1661-1945）的臺灣文獻為探討範圍；
2. 國立政治大學高桂惠教授：明清小說中的「禮物」研究——以「神魔小說」與「人情小說」為主；
3. 國立清華大學陳玨教授:西學東漸中上海的物質文化——以漢學史為角度。

以上兩個整合型研究計畫的宗旨，是透過多年期科技部計畫的持續推動，形成一個立足臺灣、面向國際的「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的國際化「交流圈」。

這前後銜接的兩大整合型計畫中的八個子計畫，角度各異，涉及「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的方方面面，構成設計中的臺灣「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國際化「交流圈」的基礎，然而這還不是它的主軸。此主軸是由系列整合型計畫中的「總計畫」來擔任，它的運轉，可以從 2010 年底展開的「漢學視野中的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臺北學術系列沙龍，到 2012 年初創辦臺北「金萱會」的過程中，看出軌跡。具體來說，前者是後者的準備，而後者則是筆者在科技部兩大整合型計畫中所致力推動的重要成果。

筆者曾這樣撰文介紹臺北「金萱會」：它的靈感，來自上世紀末在漢學界名聞遐邇的兩大學術沙龍，即美國康橋（Cambridge）「紅粥會」與日本京都「蟠桃會」。康橋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而「紅粥會」的主人，則是哈佛大學東亞系與音樂系合聘教授趙如蘭。趙如蘭的父親是當年「清華四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先生，父女兩人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趙如蘭曾在家中客廳邀請南來北往的漢學界名流，講演學術新發現，座下聽眾不乏名重一時的哈佛教授和前途無量的年輕研究生，席間賓主品嘗一碗女主人熬的紅粥，名曰「紅粥會」。而「蟠桃會」則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小南一郎為主持人，他是京都學派第三代傳人之一，受過吉川幸次郎的親授。與「紅粥會」不同，在「蟠桃會」並無蟠桃可嘗，只因小南一郎當年以研究《神仙傳》成名，所以將這一「雅聚」命名為「蟠桃會」。其主場在京都大學校內的「樂友會館」舉辦，成為日本關西漢學界一道亮眼的「風景線」。筆者當年在海外，與趙如蘭和小南一郎兩位前輩皆有過交往。筆者認為，「紅粥會」和「蟠桃會」看似古代文人間的「雅聚」，其實何嘗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小型學術「研討會」。於是，在執行科技部整合型研究計畫「總計畫」時，便產生創辦臺北「金萱會」的念頭——以一杯臺灣「金萱茶」饗客，邀請國際一流學者來臺，分享其在漢

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的新成果，與中文世界的學術界展開對等交流。這個想法，同時得到國立清華大學校方支持，並與筆者主持的清華各項大型漢學研究計畫通力合作，漸次推動。

為作籌備，筆者從 2010 年底起到 2011 年底兩年時間內，以科技部「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等為主軸，連袂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先試辦了「漢學視野中的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臺北學術系列沙龍。這個系列沙龍可視為「金萱會」前身。筆者以「沙龍」即小型高端的「研討會」為理念，每場研討會分別設計主題，以「清詩與唐詩中的物質文化」、「從《金瓶梅》到《聊齋誌異》」、「高羅佩《書畫鑑賞彙編》」、「戲曲與物質文化」、「晚清海外遊記與物質文化」、「從古鈔本看物質文化」等為核心，選擇臺灣學界感興趣的題材，邀請國際學者前來共襄盛舉，並「以臺灣為主」，由科技部「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各子計畫主持人——王安祈教授、高桂惠教授、陳室如助理教授、李元皓助理教授等，擔任主講人或主持人的重要角色。

除上列科技部「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團隊成員外，這六次系列沙龍的主講人和講評人，還有劍橋大學講座教授麥大維（David

圖四　劍橋大學講座教授麥大維是漢學界在唐代研究領域的權威人士之一，門下歷年指導過的博士生中成名人物不少（包括武俠小說家金庸在內），也來參與「漢學視野中的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臺北沙龍

McMullen)、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浦安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施吉瑞(Jerry Schmidt)、國立臺灣大學教授陳葆真、加州柏克萊大學副教授袁書菲(Sophie Volpp)、京都大學準教授道坂昭廣和古勝隆一、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巫仁恕、羅馬大學研究員費琳(Federica Casalin)等。這六次系列沙龍非唯講者「群賢畢至」,聽眾中的知名人士亦「長少咸集」,不乏臺灣老作家張曉風和哈佛年輕教授李惠儀等的參與。

以上採用「沙龍」作為外形的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高端國際小型研討會,深獲學界的歡迎。於是,在「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擴展」整合型研究計

圖五　金萱會開幕合影

圖六　國立清華大學陳力俊校長於2012年金萱會開幕視訊致詞

畫付諸實施時，我們決定在國立清華大學一百零一年校慶當日（2012 年 4 月 29 日）創辦臺北「金萱會」。清華大學陳力俊校長因在新竹主持校慶不能親臨臺北「金萱會」，特用錄影方式為「金萱會」開幕致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亦作嘉賓致辭。仿「紅粥會」與「蟠桃會」各有主場的形式，臺北「金萱會」的主場設在福華文教會館十四樓貴賓廳，並有配合的各種「會外會」，迄今已舉辦五場，場場高朋滿座。

臺北「金萱會」的主軸之一是「漢學」視野中的「物質文化」研究。舉例而

圖七　中央研究院王汎森副院長於2012年金萱會致詞

圖八　科技部人文司鄧育仁司長於2013年金萱會致詞

言，在 2012 年 10 月臺北「金萱會」上，討論的主題是與「物質文化」研究密切相關的「史文、磚與墓誌」，在三位來賓中，德國慕尼黑大學前副校長葉翰（Hans van Ess）教授，主講《史記》和《漢書》文本中的新發現；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分院長倪克魯（Lukas Nickel）教授，主講「磚」作為物質文化；日本京都大學道坂昭廣教授，主講「盧照己墓誌」（盧照己為「唐初四傑」之一盧照鄰的弟弟）。在漢學史上，向有所謂「慕尼黑學派」和「京都學派」之說。本次「金萱會」的「會外會」，請葉翰介紹「慕尼黑學派」，道坂昭廣介紹「京都學派」，使臺灣學術界聽眾在短短的半天中，能夠「片言明百意，坐馳役萬景」，聽到的不僅是兩個學派的具體介紹，而且可進一步用「滴水觀日」和「以斑窺豹」之法，對上述種種不同的漢學研究風格產生直觀的感受。眾所周知，美國漢學的發展取徑與歐洲和日本不同，在 2012 年 12 月和 2013 年 6 月的兩場「金萱會」上，我們分別邀請了加州柏克萊大學戴梅可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Martin Kern）講座教授演講，展現美國西岸和東岸的特色學風。

臺北「金萱會」內容豐富，是場場相接的「群英會」。筆者所編《漢學與物質文化：國立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芹獻》（臺北：聯經，2011）和《漢學與物質文化二集：從臺北「金萱會」到「新漢學」論壇》（臺北：聯經，2013），對此有全面的學術史背景描述。本節限於篇幅，只能在文中從以上二書的相關部分中稍加摘引，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閱這兩本書。此外，筆者學術部落格「橋畔垂楊下碧溪：漢學典範轉移與物質文化新視野」內，有筆者主持

圖九　慕尼黑大學前副校長葉翰於2012年金萱會演講

圖十　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戴梅可於2012年金萱會會外會演講

圖十一　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柯馬丁於2013年金萱會演講

的各類研究計畫活動報導，並定期更新資訊，網址為 http://blog.sina.com.tw/juechen，讀者亦可上網參閱。

三、 科技部拋光計畫「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

臺北「金萱會」的重點是「請進來」，或者說將海外的新研究匯入中文世界，它的籌備和創辦只是上述科技部「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系列大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這些大型研究計畫的另一面相，以科技部「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拋光計畫為高潮，重點在「走出去」，希望有助於將中文世界的「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成果推向國際學界。

如前所述，筆者擔任科技部「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拋光計畫主持人後，在 2012 年 5 月舉辦的「新漢學」京都論壇上，推動成立「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該聯盟由國立清華大學、京都大學和加州柏克萊大學三所太平洋兩岸頂尖學府的相關同仁發起，是國際間首創的漢學界與物質文化研究界共組的學術聯盟，筆者於聯盟中擔任總幹事，本聯盟的計畫書中規劃：未來五年內，在歐、亞、美、澳各洲中，再選出多個本領域研究最具

圖十二　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在京都大學成立後合影

成果的國家，每國接納一所頂尖的學府入「盟」。聯盟旨在以分布在各大洲不同國家的多所頂尖學府為主體，以「整合型」方式推動漢學與物質文化的跨學科與全球化發展，並以成為國際間本領域引領風潮的學術組織為己任。

在 2012 年 5 月「新漢學」京都論壇期間成立「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的前一天，科技部「文學藝術與物質文化」整合型研究計畫團隊全體五位教授，外加三位碩博士研究生（其中一位曾榮膺「臺灣十大傑出女青年」的稱號），到京都參加「新漢學」論壇的「會外會」，即「漢學與物質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該「會外會」定位為北臺灣地區（以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為代表），與日本關西地區（包括京都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同志社大學、立命館大學、奈良女子大學等）名校之間，在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的對等交流，對促進日本漢學界與中文世界的合作有顯著效果，同時也為「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在「新漢學」京都論壇上的成立平添色彩。以上種種，筆者在《漢學與物質文化二集》中有詳細介紹（本節限於篇幅，僅作部分摘錄），讀者可參考。

綜上所述，筆者從主持「超越文本」學門規劃推動計畫開始，中間經過兩大連續性整合型研究計畫，到「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拋光計畫，多年來始終有幸在科技部大型計畫的框架內，推動「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在中文世界的發展。這些年之所以能取得若干微薄的成績，首先要感謝科技部的補助計畫支持，同時國立清華大學校方也給予本校多項相關計畫協助和指導，而筆者在這些年主持的各種大型研究計畫中的一大個人收穫，則是逐漸孕育「漢學典範大轉移」的理論框架，試圖從新的角度解讀漢學史（也包括漢學與物質文化）的過去和未來發展。

筆者在 2009 年發表的〈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緣起說明〉（《古今論衡》二十卷）一文中談到：漢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在幾個世紀的發展中，經歷了兩次「典範大轉移」（paradigm shift）：第一次從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完成了從「傳教士漢學」到「學院派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地點發生在歐洲內部。第二次出現在二十世紀中葉第二次大戰前後，這是一場從以歐洲為代表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之漢學「典範」，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之漢學典範的「大轉移」。以前作為「東方學」一部分的漢學（Sinology），主要是研究中國古典，而此後作為「東亞研

究」一部分的海外中國學（Chinese Studies），開始逐步轉向以現代中國研究為主。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世界發生巨大變化，在全球範圍的廣義漢學研究的「氣運」，正以相當快的頻率，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動。照此速度，也許只要再過十五到二十年，漢學研究的重心，就會從歐美返回到東亞來，出現第三次國際性的「典範大轉移」。這場「典範大轉移」，從二十世紀末已悄然開始，根據筆者對之所作的「有跡象的預測」，未來它或許會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作為變化的標誌之一，因為語言、思維模式與「典範」三者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筆者認為，隨漢學「典範大轉移」研究的展開，逐漸會自然導向一種與傳統漢學不一樣的「新漢學」。這種未來的「新漢學」會花開五葉，葉葉不同，而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的進一步匯流，應該也是其中的一葉。為此，我們創辦「漢學與物質文化叢刊」全力推動。今天我們從「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的再出發，便也是走向「新漢學」多樣化途徑中的一條。

總而言之，科技部近年以四個大型前瞻性研究計畫推動「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領域的發展，已在國際上初成氣候，打開局面；今後，「國際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聯盟」將承續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方興未艾的大勢，再創新潮。展望未來，筆者認為，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研究可以涵蓋包括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在內的許多領域，而中文世界應該有屬於自己的學術論述，是以筆者目前正準備撰寫一本題為《漢學典範大轉移》大部頭專書，正面處理這個議題，也為以上各項大型研究計畫的執行，劃上理論性句號。